

推动

PROMOTING

绿色发展

GREEN
DEVELOPMENT

生态治理与结构调整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吴一超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推动 绿色发展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生态治理
与结构调整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吴一超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动绿色发展：生态治理与结构调整 / 吴一超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

ISBN 978 - 7 - 5201 - 5666 - 0

I. ①推… II. ①吴… III. ①生态环境 - 综合治理 -
研究 - 中国 IV. ①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14045 号

推动绿色发展：生态治理与结构调整

著 者 / 吴一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胡庆英

文稿编辑 / 马甜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301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666 - 0

定 价 / 1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造成了生态与环境的破坏，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实现“绿水青山”，适宜的生态环境规制手段和有效的产业结构优化方案是必不可少的。围绕这一话题，本书从生态治理与结构调整这两个切入点来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机制和制约因素，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提供理论框架，为推动绿色发展的环境政策提供现实依据。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六篇。

第一篇的主题为环境规制，推动绿色发展的重点之一在于环境规制，其也正是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本部分的三篇文章分别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的类型、测算了中国各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探讨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环境规制等政策措施对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文章结果显示：近十年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区际差异巨大，整体由沿海向内陆递减；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且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 U 形关系，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且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从影响机制来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来改善空气质量，同时加强环境立法有利于企业扩大环保投资。

第二篇的主题将绿色发展聚焦于生态治理这一话题，为实现绿色发展，减少我国城市和工业生产中的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成为两大治理重点。第一篇文章探讨了环保税对降低环境污染的显著影响，结果显示，环保税的实施有助于减少 SO_2 的排放量，环保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

用。第二篇文章从区域发展视角分析了城市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产生负向作用，而城市的人均面积和人均 GDP 的增长则会对人均碳排放增加产生正向作用。第三篇文章从规模、结构、技术、管制四个渠道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增加了碳排放，技术效应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管制效应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三篇的主题为产业结构调整，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一篇文章从区域产业集聚的角度来探讨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其结果证明，产业集聚规模、效益、能力对环境污染是具有抑制作用的，其中以珠三角地区九市作为研究对象，其对外开放程度也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第二篇文章对中国四大工业基地主要的 21 个城市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影响生态效率的因素，指出各个城市的生态效率基本上处于上升状态，其中京津冀工业基地主要城市的生态效率增长最快。第三篇文章则以江苏省为例，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降低了水污染程度，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第四篇的主题为土地开发，土地资源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稀缺且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第一篇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重点研究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经测算发现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平均情况显著优于安徽省，且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和城市与港口之间的距离呈“∩”形曲线关系。第二篇文章则探索了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作用，结论表明土地资源约束对实际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土地资源消耗引起的增长尾效总体上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第五篇的主题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眼光不但要汇集于内陆，而且要拓展到广阔的海洋。本部分的两篇文章侧重探讨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构建了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其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状态良好，而环渤海各省份海洋环境也有所改善，同时，产业结构变

化越快的省份，其环境承载力水平越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

第六篇的主题为绿色发展，纵观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全过程，伴随的是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探讨了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废气污染等问题的耦合关系，其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向，说明我国现处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的过渡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初期阶段，新型城镇化与减轻环境压力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另两篇文章则分别研究了新一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通过金融支持促进城市群的绿色发展，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产业结构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外向度、人口素质和人口密度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则有负向影响；城市金融效率对绿色发展的作用为正；而绿色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最后，特别鸣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 级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郭贞利同学，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涂曼娅同学，以及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 级经济学专业白雨薇、薛淋云、陈识涵、张寅、杨涛、田纪驰、王云、花泽苏、郭茜、姜静静、黄钰、王丹丹、高雨欣、朱晓妍等同学，对本书的贡献。

吴一超

2019 年 6 月 19 日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目 录

◆ 第一篇 环境规制

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3
基于熵值法的中国区域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研究	40
环境规制与工业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57

◆ 第二篇 生态治理

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实证分析	75
城市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	90
FDI 对碳排放的影响途径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	105

◆ 第三篇 结构调整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关系研究 ——基于珠三角地区的面板数据	123
基于 DEA-Malmquist-Tobit 方法的中国四大工业基地生态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40
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与水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160

◆ 第四篇 土地开发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177
--------------------------------	-----

江苏省经济增长中的土地资源尾效研究 196

◆ 第五篇 海洋经济

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与渤海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
 脉冲响应分析 213

我国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236

◆ 第六篇 绿色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 253

新一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68

长三角地区金融支持对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291

第一篇

环境规制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受到重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改善环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环保法规、加强环境执法、推广清洁生产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污染问题，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成本压力。

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环境保护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要求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企业在项目开工前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

然而，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企业环保意识有待提高。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惜牺牲环境，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其次，环境执法力度有待加强。一些地方存在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问题，导致企业违法成本过低。最后，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一 绪论

随着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我国 GDP 从 2001 年的 11 万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90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3.1%。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是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造成了生态与环境的破坏，降低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发展质量，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也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环境规制手段渐趋完善，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加强。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国家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也提出“要通过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改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在 2014 年达到峰值后，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废水排放量和废气排放量也逐渐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情况有所好转，环境规制取得一定效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实现“绿水青山”，合适的环境规制手段和强度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环境规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何影响？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有何不同？我们该如何协调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都是亟须回答的问题。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 2004 ~ 2015 年中国 29 个省级区域（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除外，重庆市数据归入四川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全国整体角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并进一步从东、中、西部角度就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区域差异性研究，最后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规制现状提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价值来看，目前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主要用于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分类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体系，使研究结果具备可靠性和可比性，为环境规制指标体系的准确建立提供了参考。从实践价值来看，本文区分了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分别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同时，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因而有利于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提出更为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 文献综述

（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最初用于分析环境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于 1991 年在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环境影响问题时提出来的，Grossman 和 Krueger（1991）利用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数据库的二氧化硫、烟尘等环境污染数据与贸易密度、人均收入的平方、制造业的贡献率进行回归之后，发现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 U 形的关系。当前，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研究结果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二是环境规制抑制经济增长；三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1. 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 Porter（1991）

提出的“波特假说”。其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不仅不会抑制企业的发展水平,反而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发展。Domazlicky 和 Weber (2004) 以美国 1988 ~ 1993 年化工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环境规制能够提高化工企业的生产效率。Azevedo 等 (2010) 研究了巴西冶炼业环境规制与行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指出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行业技术革新,可以通过在环保技术革新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来改善冶炼行业高污染的发展状况。Hanna (2010) 运用美国企业的面板数据,估计《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造成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上升了 5.3%,产出上升了 9%,因此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促使产业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促进经济发展。Lee 等 (2011) 对美国汽车尾气排放数据的分析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李斌等 (2013) 利用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其设定的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推动了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夏勇、钟茂初 (2016) 以及夏勇、胡雅蓓 (2017) 用脱钩理论分析显示,逐渐增强的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发展并转变为绿色发展方式。王群勇、陆凤芝 (2018) 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显著,在东部地区表现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跨越门槛值后,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再显著。

2. 环境规制抑制经济增长

Jorgenson 和 Wilcoxon (1990)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速在 1973 ~ 1985 年这 13 年内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因此认为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发展。Sancho 等 (2000) 实证分析了在环境规制条件下,西班牙国内家具及木质产品制造业行业产出明显降低,环境规制对行业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Keller 和 Levinson (2002) 则利用美国的州际数据分析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 FDI 的流入存在负面影响。Amagai (2007)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增大将降低生产率,虽然在环境规制政策调整

下企业会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然而由技术提升带来的经营利润远低于企业增加的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Chintrakarn (2008) 采用随机前沿 (SFA) 模型，利用美国国内州际数据，分析得到环境规制没有提升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效率。

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国内学者运用中国的数据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叶祥松、彭良燕 (2011)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环境规制的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环境规制阻碍了其经济增长。李玉楠、李廷 (2012) 对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抑制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李钢等 (2012) 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CGE) 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环境规制达到限定指标时，经济增长率会下降约 1 个百分点，同时会抑制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出口。谢众等 (2013) 利用中国 2000 ~ 2010 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指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李春米、魏玮 (2014) 运用数据包络法 (DEA) 测算了中国西北五省份 2000 ~ 2008 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标值，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降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易信、郭春丽 (2017) 把环境要素纳入增长核算框架，强调环境规制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显著约束经济发展。

3.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有的学者未找出有力证据证明相关影响，如 Shadbegian 和 Gray (2005) 通过运用美国 1979 ~ 1990 年国内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相关数据，构建了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未得到有力证据证明环境规制显著影响生产效率；Martin 等 (2009) 的研究也表明没有显著证据表明以能源税为代表的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制造业产出水平；Rutqvist (2009) 通过对美国 48 个州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亦没有显著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有的学者则是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不确定性影响”的结论，如 Urpelainen (2011) 通过建立一个不确定条件下的博弈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傅京燕和李丽莎 (2010) 以我国行业竞争力为视角，实证分析认为环

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没有显示出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熊艳（2011）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形关系。祁毓等（2016）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在短期内减少污染和提高环境质量，但会降低技术进步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凸显，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将逐步被抵消，并由负转正，所以在长期内会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张华明等（2017）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满足传统的 EKC 曲线，而是倒 N 形曲线。

（二）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国外关于分环境规制类型研究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较少，其在近几年来才受到关注。Xie 等（2017）使用 2000 ~ 2012 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阈值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手段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关系，并且可以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但是对监管严格性有不同的约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存在双重阈值，并且存在提高生产率的最佳严格范围；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手段存在单一门槛，且目前的严格程度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都是合理的。Shen 等（2019）从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利用阈值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的非线性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存在行业异质性，在重污染行业，过高的环境监管力度削弱了技术创新，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类型与 ETFP 之间呈显著的 N 形关系。Ren 等（2018）将环境规制分为三类——命令控制型、市场型和自愿型，根据中国 30 个省份 2000 ~ 2013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STIRPAT）分析这三种规制手段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在东部地区，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没有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相比，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更加显著地提高生态效

率；在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更能发挥积极作用，而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没有显著影响。Wang 和 Shao（2019）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类型，采用面板阈值回归技术观察 2001 ~ 2015 年正式和非正式环境法规对 G20 集团绿色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以严格环境政策为代表的正式环境法规，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手段仅在高水平经济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低水平经济阶段并非如此；基于非市场的环境规制在高、中、低三个阶段都有显著的作用，但其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各不相同。另外，相比较而言，除了各国技术水平较高的情况，以环境相关技术和教育水平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具有重要且正向的影响。

国内分环境规制类型研究其经济效果，起步较晚，相关文献较少，但近两年来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如原毅军、刘柳（2013）将经济型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类，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彭星和李斌（2016）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可明显促进工业绿色转型。黄清煌等（2017）研究发现，在环境分权体制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冯志军等（201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申晨等（2017）的研究表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曲线呈 U 形。

（三）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还存在以下问题。①大多数学者对经济增长的衡量都是基于“量”的概念，少量学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而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更有现实意义的。②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通常并不区分环境规制类型,而是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笼统地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然而近年来分环境规制类型研究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对环境规制分类型讨论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而环境规制类型如何分类,在每一分类下又如何用指标衡量都是急需探讨的问题。③不同学者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有较大差异且大都使用单一型指标,导致实证研究结果有偏差,因此应该探索使用综合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以增强实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量”的概念,而笔者认为环境规制的根本意义在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而非单纯的数量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一内涵纳入被解释变量,通过去除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并以2004年为基期计算实际人均GDP,更准确地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果;第二,本文区分了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并分别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通过建立不同环境规制手段的规制强度指标,进行差异化研究和分析;第三,本文从整体和分区域两个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有整体性的结论,又有比较性分析,研究框架更加全面。

三 理论基础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环境问题困扰着全球,人类对生存与发展的认知愈加深入,经历了从“生存”到“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初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即“人类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得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需求,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其后,随着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东京宣言》的发表以及《21世纪议程》的签署,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可持续